

澳門街名文化

關俊雄*

一、前言

街道於城市中並不罕見，但澳門的街道，卻因有著別具一格的街名文化而引人注目，一來是街名的物質載體：街道名牌，是以葡萄牙瓷磚畫藝術作為藍本，其藍色和白色的主調，配以中文和葡萄牙文的街道名稱，成為了澳門的地方特色之一，如藝術品般鑲嵌在澳門的大街小巷。二來是街名的符號載體：中葡文街名的文字，閃爍著澳門的文化特徵，加之過去數百年沉澱於其間的人述史事，令其又滿負著歷史的承載。

由於澳門街道的別具特色，過往不乏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當數胡紀倫（Cesar Guillen Nunez）的《澳門街》¹，作者於書中討論了四十多條街道的過去，從而探索澳門四百年來變幻莫測的歷史，活靈活現地述說中葡商人、領袖、神靈與聖人、英雄豪傑和文人雅士的故事。

另一本著作《澳門街道的故事》²則選擇了全澳三十多主要街道，旁及附近的地區，考察的範圍基本涵蓋了澳門地區的主要領域，考察的內容以地為經、以史為緯，透過物換星轉，喚起集體難忘的回憶；見物更見事與人，整理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再現了群賢的風采；紀錄了四百多年華洋雜處、中國最早對外開放城市的實貌，捕捉到小城中西文化各美其美，又有所融合。

論文方面，則有傅玉蘭的《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³對澳門街道的標幟作了分類和統計，闡述了它們的來源特點、數量變化情況以及

*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於澳門文化局文化財產廳任職高級技術員。

1. [葡]胡紀倫（Cesar Guillen Nunez）著，梁家泰攝影，方無偶譯，《澳門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2. 劉羨冰：《澳門街道的故事》序，澳門培道中學歷史學會出版，2005年。
3. 傅玉蘭：《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載於《澳門研究》第5期，第47-75頁。

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和中西文化結合的現象；黃翊的《澳門街名規律初探》⁴則從語言結構的視角和文化解讀的視角分析澳門街名的規律；彭海鈴的《澳門街道名稱與城市文化形象》⁵則認為澳門的街道名稱濃縮了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文化，是中葡文化在澳門兼容並蓄的具體說明，也體現了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顯示了澳門的城市發展面貌，反映澳門社會不斷向前邁進的積極步伐，從而展示了澳門與別不同的城市文化形象，並據此作出闡述。

如上所見，過往對澳門街道的研究，既有分類統計的，也有追溯史事的，由於前人在這些方面已經作出了傑出的研究，所以本文無意在這些方面再作贅述。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曾說：“命名過程改變了甚至連動物也都具有使感官印象世界，使其變成一個心理世界，觀念和意義的世界”⁶，故筆者在此會把注意力放在街道的“名稱”上，看這個由名稱構成的“意義世界”裏包含了甚麼信息，又如何體現了澳門的歷史和文化。

二、名人街名：中、葡間的兩極取向

在1999年回歸祖國前，澳門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這段特殊的歷史自然給澳門留下了很多的痕跡，這既有物質上的，如諸多葡式的歷史建築仍有不少保存至今，也有精神上的，如葡人留下來的風俗文化以及本文的研究對象：澳門的街名。那些具有葡萄牙特色的街名，在其“名稱”這個符號背後，包括著一系列精神圖景，下面我們便來對這些街名進行審視，以尋找內裏的蘊涵。

澳門街名的葡萄牙色彩在這個小城中隨處可見，一來是澳門的街名牌上會同時標有中、葡文街名，二來是不少街名甚具葡國特色。前

4. 黃翊：《澳門街名規律初探》，載於《澳門研究》第24期，第204-245頁。

5. 彭海鈴：《澳門街道名稱與城市文化形象》，載於《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臺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出版，2007年，第95頁。

6. [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于曉譯，《語言與神話》，三聯書店，1988年，第55頁。

者是一目瞭然的，故這裏便不再多花筆墨闡述了，而後者則主要可分為兩大類：

一是以葡人名字命名，且大多為政治人物，而在這其中又以一些澳督之名命名為最多，如高士德大馬路（Avenida de Horta e Costa）、羅理基博士大馬路（Avenida Dr·Rodrigo Rodrigues）、巴素打爾古街（Rua do Visconde Paço de Arcos）等。此外，就是以葡萄牙總統或國王之名命名的，如約翰四世大馬路（Avenida de D·João IV）、士多紐拜斯大馬路（Avenida de Sidonio Pais）等。另外，還有一些澳葡政府或葡萄牙本國的官員也被用來命名澳門的街道，如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Avenida do Doutor Mário Soares）、伯多祿局長街（Rua de Pedro Nolasco da Silva）等。

其實，葡萄牙歷史上不乏名人，最為世人熟知的當然是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達·伽馬（Vasco da Gama）等航海家，而那些與澳門發生過交集的葡萄牙名人也不少，有歷史學家、文學象徵主義派代表人物庇山耶（Camilo de Almeida de Pessanha），以數學家、天文家的身份為清廷服務的北京主教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著名詩人、《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又名《葡國魂》）的作者賈梅士（Luis de Camões）等。但澳葡政府在給街道命名時，卻選擇性地對這些航海、宗教、文化界的名人略過，而大量地偏重政治人物的命名，僅有庇山耶街（Rua de Camilo Pessanha）是以政治界外葡人之名命名的街道。

說到這裏，不妨以澳門街名中那些以中國名人命名的街名作一下比較，這類街名主要有：孫逸仙博士大馬路（Avenida Dr.Sun Yat Sen）、何賢紳士大馬路（Avenida do Comendador Ho Yin）、高可寧紳士街（Rua do Comendador Kou Ho Neng）、盧九街（Rua do Lucao）、冼星海大馬路（Avenida Xian Xing Hai）、鄭觀應大馬路（Avenida Zheng Guang Ying）、和隆街（Rua do Volong）等。如果說，中國名人街名之所以在數量上明顯遠少於葡國名人街名，是由於澳門當時受葡萄牙管治，主宰命名權的葡人更傾向以本國名人命名是理所當然、無可厚非的話，那麼，在成份上，則可明顯看到葡人命名街道時的偏向性。在上述中國名人中，僅孫中山（孫逸仙）是政

治人物，但對其之命名並非以政治稱謂而名之，而是代之“醫生”以稱之（按：中文街名“博士”實為誤譯）；何賢雖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活動，但他和澳葡政府過從甚密，而且最廣為人知的身份並非政治人物，而是著名商人；高可寧、盧九則同樣是澳門史上著名華商；冼星海作為一名作曲家則從未涉足政壇；鄭觀應雖然和孫中山私交甚篤，但並未直接參與太多政治活動；和隆街雖是以清代奉政大夫呂和隆之名命名，但他一來是天主教徒，二來家境富裕，據說當年澳葡當局也曾向他借糧餉。⁷可見，在中國和澳門歷史上聲名均不見顯赫的呂和隆能被用以命名街道，乃是基於他和澳葡政府的親密關係。

由此可知，澳葡政府在用人名給街道命名時的兩極取向：以葡國名人命名者，量多且以政治人物為主，對以中國名人命名者，量少且非政治人物為主。澳葡政府在給街道命名時，特別有意地注重政治上的因素，通過以大量的葡國政治人物，尤其是直接管轄澳門的最高級官員：澳督來傳達出澳門受葡萄牙管治，政治上是其殖民地之信息。而毗鄰的香港，其街道也有不少是以政治人物之名來命名的，如以首任港督命名的砵甸砵街（Pottinger Street），其原因和澳門的情況應同出一轍。

三、紀念歷史：歌功頌德的政治需要

充滿葡國特色的第二類街名是以紀念澳葡或葡國歷史上重大事件為題的，而在這一類的街名中，我們同樣不難看到澳葡政府所表達的政治訴求。以得勝馬路（Estrada da Vitoria）為例，此街名顧名思義是紀念一場勝利，是一場在澳門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軍事勝利。

16世紀，新航路的開辟引發了一場空間革命，使在地球兩端的東西方得到了更緊密的連結，而當時來到遠東的，除了葡人，還有其他西方國家，比如說荷蘭，出於對葡人在遠東貿易獲利甚豐的嫉妒，荷蘭人於1601-1688年間，先後六次發起對澳門的進攻。因為正如1614年荷屬巴文維亞總督所言：“如果荷蘭人攻佔了澳門，不僅能代替葡

7. 唐思：《澳門風物志（續篇）》，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第36頁。

葡萄牙人變為日本市場的中國絲貨供應商，而且可以打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的支柱，從而可以直接指望全世界渴望得到的中國財富和物產。”⁸

荷蘭對澳門的數次進攻中以1622年那次最為激烈，當時澳門教區的代理主教安東尼奧·多·羅薩里奧（Alvaro do Rozario）記述了荷蘭的軍隊如何來勢洶洶：“6月21日，有13隻荷蘭船，包括9艘大軍艦和4艘帕塔索船開到了這裏，加上早先抵達的四艘軍艦，一共是17隻船。當月22日，他們派出8隻小船對哨位進行偵察，荷蘭人在各處與我們的人交火，尤其是在割狗環……23日，聖約翰日的前一天，敵人派出兩艘大船，其中一艘裝著兩排重25至30阿接斯特爾的大炮，並開始炮轟伽思蘭炮臺，炮轟從下午兩點一直持續到晚上六點。巨大的炮聲像人恐怖的雷聲，瘋狂的炮彈像一道閃電，密集得像驟雨一般。空氣渾濁，天空硝煙瀰漫，遮住了太陽；喊聲震天；原本用來叫醒人們的鼓聲和哨聲現在混亂地響成一片。密集而連續的炮轟炸毀了一些房屋……（筆者按：24日）天還沒有亮，太陽還沒有用它那明亮的光線照亮我們的地平線，這不是一個晴朗的、那個在世界各地和往常一樣的早晨，敵人用炮彈來紀念這個早晨，他們開始了更猛烈的炮轟。到天大亮的時候，有兩隻帕塔索船，22艘小船和5條巴爾卡薩船向割狗環駛來。”⁹

澳門議事亭書記官雷戈（Diogo Caldeirado Rego）在次年11月27日寫於澳門的一份報告中敘述了當時最後戰勝荷蘭人的經過：“他們攻打東望洋山，企圖佔領它，與其他兩支攻打部隊會合。一下船，他們立即分散，一邊用火槍射擊，一邊向山高處攀登。那裏已經有幾個我們的人在阻擊他們。此時，從城裏及各個泊口又趕來了更多的人。眾人鬥志昂揚，從各處攻打他們，用火槍和劍殺死了許多敵人，把負重比較輕的逃脫者追得游上了船。田野和海灘上陳屍400多具。其中有一步兵和想隨同他們作戰的一海軍將領，還有1個副官、8個步兵上

8. C. R. Boxer: *Fidee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73, The Hague Martinus Nijloff, 1948, 轉引自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9. [葡]安東尼奧·多·羅薩里奧（Alvaro do Rozario）：《關於荷蘭人襲擊澳門的報告》，載於《文化雜誌》第75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10年夏季刊，第60-61頁。

尉，其他是上士和戰地軍官及其當中的主要知名人物。傷員近200人。後來得知，受傷者極少得以逃脫，一些被俘，其中有一個上尉，是個主要人物，至今還在我們手中。他們丟下了600多支火槍、1門砲、許多劍、盾牌和戟、7面軍旗，還有幾箱東西。這些都成了彰揚此次勝利的戰利品。”¹⁰

整個戰鬥，荷軍有136人陣亡，126人受傷。死者中有上校7名，少校4人，旗手7人，4艘荷艦被燒毀。相比之下，葡軍只陣亡了4人，另外有數十人受傷而已。為紀念這一空前的大捷，澳葡政府後來將6月24日定為澳門的“城市日”。¹¹此後，澳葡還通過多種不同的形式紀念這次勝利，如在得勝地點東望洋山上立荷蘭俘虜酋長石像，後來又開闢了得勝花園以及其中的得勝紀念碑。

同類的街名，還有為了紀念葡萄牙人在1910年10月5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而命名的民國大馬路（Avenida da República）、十月初五街（Rua de Cinco de outubro）等。由此可見，在以歷史事件命名上，澳葡政府的指導思想和用歷史人物命名時所持的策略高度地一致，撇開那些文化上、宗教上的大事，單單去紀念那些政治性的、有利於歌功頌德的事件。當年是如何英勇地保衛了這個城市，使之免受荷蘭人之入侵。當年在遙遠的本國是如何掙脫了帝制的枷鎖，建立起共和國政權……這些光榮的時刻就這樣一次次地在歷史的長河中透過街名在訴說、在流傳。

可見，這類街名的命名和以葡政治人物之名命名之目的相若，是用以對葡萄牙本國進行宣揚和歌頌的，縱觀此兩類街名，可以發現其政治性之強烈。其實，要以葡萄牙特色命名街道的方法很多，但澳門的街名卻偏偏如此被選擇，這裏面反映的正是澳葡政府對澳門這個殖民地進行統治的權威性，需要更多地被認可和接納，而這種訴求正正通過街名作出了表達。

10.《中國聖名之城自始至1623年情況簡報》，載於魯斯（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 Luz）《印度議事會》，里斯本，1952年，第612-613頁。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

《澳山、東西望洋考》，載於《澳門研究》第15期。

11. 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5頁。

四、中葡異名：是並存？還是沖突？

如前所述，澳門的街名兼具中葡名稱，而有趣的是有些中葡文的街名不是直接對譯過來的，就是說，中文街名和葡文街名的意思可能是風馬牛不相及。茲舉數例如下：

“亞美打利庇廬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更廣為人知的稱呼法是“新馬路”；三層樓斜巷（Calçada de Francisco Antóio）中“三層樓”對應的“Francisco Antóio”是一個葡萄牙人名；十字巷（Travessa do Muro）葡文原義為牆巷；虱嚙街（Pátio de Felicidade）葡名義為快樂街；龍嵩街（Rua Central），葡名的意思是中央街。

由見及此，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現象的背後到底說明瞭甚麼？音義完全相異的中葡街名告訴了我們甚麼？是否反映中葡文化的對立，在街名上不依從對方的命名而要另辟新徑嗎？前文提到，澳葡政府往往利用一些街道的命名來歌頌本國，強化管治，那麼，是否這種策略引起了澳門華人社會的反感，遂在中文街名中無視葡文原義，而賦之以新的名稱和含義？簡單來說，在同一條街道上那兩個音義完全不相干的中葡街名，它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並存不悖？還是互相沖突？

筆者認為，中葡異名反映的是在街名系統上中葡文化的互不干涉，各行其道，自成體系，和而不同。這是並存而非沖突，下面試從兩個方面去觀察：

首先，我們不妨審視一下上文提到的那些中葡異名的街名，這些葡文街名中有些是葡萄牙人名，有些則只是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用詞，並沒有甚麼葡萄牙的特色，所以，由此可以推斷對葡萄牙文化的抵觸並不是造成中葡異名的根本原因或者說唯一原因，因為連那些不具葡特色的名字也被重新賦予了與原意無關的中文街名。

接著，我們再來看幾個不存在中葡異名的街名。味士基打（Coronel Mesquita）是一個被澳葡視之為英雄的人物，他於1849年8月帶兵佔領關閘、襲擊北嶺炮臺，殺害清軍官兵，後來逐漸升至上校，澳門便有一條紀念他的街名：美副將大馬路（Avenida do Coronel

Mesquita)。乍看之下，這條街道的中文名未有譯作“味士基打大馬路”，是一街異名的又一個例子，但深究之下能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美副將”其實指的就是“味士基打”，中文翻譯中取了葡文 Mesquita 的第一個音，譯作“美”，而“副將”則是“上校”以前的譯法。可見中文譯法並未改變葡文街名中紀念味士基打的原義，這個殺害中國軍兵的“英雄”依舊享受著被用來命名街道的待遇。

如果說，美副將大馬路這個中文街名對葡人殖民擴張行為毫不避諱、全盤接受是令人意外的話，那麼，連勝馬路（Estrada de Coelho do Amaral）這個中文街名則可能是足以讓人匪夷所思。

按葡文街名直接翻譯過來的話，“連勝馬路”理應譯成“阿穆恩馬路”。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是第85任澳門總督，他到任後繼續澳葡政府自亞馬留（João Ferreira do Amaral）總督以來的擴張政策，他拆毀城牆，強佔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等村落，同味士基打一樣，被葡人視為英雄，所以包括連勝馬路在內的多個相鄰街道均以其名字命名。¹²

這樣一個人物被澳葡政府大肆讚揚以致以其名來命名街道尚是情理之中，而中國人把紀念他的街名譯為“連勝馬路”卻耐人尋味，不管“連勝”指的是一些人所主張的是葡萄牙擊退荷蘭人入侵澳門的戰事，還是真的如此毫無避諱地指阿穆恩的殖民擴張是勝利，均無損該街道紀念葡人偉大勝利之原意。而若屬後者的話，哪怕這不是褒揚，而只是如實地陳述當年阿穆恩的勝利，也確實令人吃驚。這令筆者想起一位臺灣學者所講：“歷史像一條河，我們無法挽留逝去的河水，卻可以從河水中看清現在的自己。河流有方向，就因為它有源頭；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才曉得要往哪裏去。了解歷史，並不是要背負過去，而是為了向前走時，能夠無後顧之憂，可以走的更踏實、更坦然。”¹³或許，用街名銘記下這段對中華民族來說不堪回首的往事，為的也是今後能更踏實的向前走，明瞭到和平共存的可貴。

12. 以阿穆恩總督命名的街道名尚有連勝台（Pátio de Coelho do Amaral）、連勝巷（Travessa de Coelho do Amaral）、連勝圍（Beco de Coelho do Amaral）、連勝街（Rua de Coelho do Amaral）。

13. 殷允芃等：《發現臺灣》，臺北天下雜誌社，1992年，第251頁。

不存在中葡異名現象的街名在澳門佔大多數，而筆者之所以在諸多選擇中挑選了這兩個街名作分析，是因為這兩個街名是最有可能存在中葡的沖突、最應該存在異名的街道。按常理說，如果中葡街名音義相異是基於彼此的沖突，中方不接納葡方的街名系統和命名，而要對之進行改造、重構的話，最有可能、也最需要另起別名的是那一類的地名？當然是那些宣揚殖民統治合理性、紀念葡萄牙政治人物的街名，而其中更應以那些紀念公然發動武裝侵略、與中方兵戎相見的街名尤甚，諸如美副將大馬路、連勝馬路這一類的街名。這類街名若置身在中西文化沖突的背境下，其原名的意義必然會被更改的，但結果卻是在這類街道中雖然中葡文不是直接對譯，但根本未改葡文中紀念殖民者的原義。

當然，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些以殖民者命名的街道出現中葡文街名音意義相異的現象，比如前述提到的亞馬留總督，他大概是澳門歷任總督中最著名的一個，被葡人視為英雄的他，在中國人眼中恰恰又是個臭名昭著的殖民侵略者。1846年被任命為澳督後，他對澳門實行了一系列殖民措施，侵奪了本屬清朝對澳門中國人的管轄權，對他們徵稅，又對違反葡法律者私自用刑；在土地上又宣佈修建由水坑尾至關閘的道路，限令中國人在一個月內遷走徵用土地內之祖墳；同時，極力掙脫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關閉了中國駐澳海關，把香山縣丞視為中國駐澳領事，不得干涉澳門事務。亞馬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華人社會的民憤，終於在1849年被沈志亮刺殺於關閘。而澳門以他命名的街道有關閘馬路（Istmo de Ferreira do Amaral）、東望洋街（Rua de Ferreira do Amaral）、亞馬喇前地（Praça de Ferreira do Amaral）以及亞馬喇馬路（Estrada de Ferreira do Amaral），不難發現，前兩者出現中葡異名的現象，後兩者則從葡文直譯形成中文街名。如果我們以純粹對殖民者的反感來解釋中葡異名現象的出現，似乎難以解釋諸如亞馬喇前地等中文街名為何出現和保留至今。

通過以上的觀察，看到音義完全不相關的中葡街名會出現在“牆”、“快樂”這些毫無葡萄牙特色的詞匯和事物上，而那些充滿殖民味道、對澳葡政府歌功頌德的街名，卻未全都出現異名現象。可見，同街異名的現象並不能簡單歸納為基於中西文化的沖突所造成

的，同時，這些同街異名的街名並未被昔日的澳葡政府強制統一成必須依葡文原意作準，反而容許中文街名自闢新徑，和葡文街名並行不悖，體現出了澳門街名文化中包容並存的人文精神。

既然造成同街異名的動因不是文化沖突，那麼到底異名的原因何在？顯然也不是文化並存，因為這只是異名這個現象所反映的結果，並不是導致異名的因素。也許，異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直接對譯的中文名有時會過於詰屈聱牙，令人無所適從，如“新馬路”的正式名稱“亞美打利庇廬馬路”。而諸如“十字巷”這類不存在此問題的地名，其異名原因是因為翻譯過程中的出錯？是中國人撇開葡名原義據自己喜好命名？還是有其他的原因？這尚需學者今後更多的探討。

五、非中非西：中西交融的產物

已故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說：“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¹⁴

季老此言一語中的，而中西文化的交流也的確是澳門歷史上最值得抹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文化之間是有生命力的，故此，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會生發出一系列反應，有沖突、有抗拒、有並存、有交匯……在前文談過一條街道中葡異名反映的中西文化在澳門之並存後，我們不妨用這最後的篇幅談一談澳門街名中所包含的中西文化交融。

文化的交融在程度上有著深淺之分，所謂淺者，大抵是在表面上兩者的和諧或疊加，依舊以街名作例，如十月初五街在意義上，是紀念葡國共和革命，而在中文的文字表記述上，則用了中國傳統農曆的“初”字，充滿著中國文化的元素。而所謂深者，則是一種已經到達難分中西、彼此水乳交融的狀態。澳門經歷了四百年的中西文化交匯之地，自然不缺中西文化深度交融的例子。

14. 季羨林：《在中外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1994年9月。

在澳門的街道標幟中，既有在中國其他城市也常見的，如“街”、“路”、“巷”等，也有一些是屬於澳門特色，其他城市少用的，如“圍”、“里”等，此外，更有一個標幟可說是澳門獨有，連一水之隔且文化內涵相近的香港也不見的，這就是“前地”。這個非中非西的新詞，正是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產物。

有學者指出，“前地”這個詞是澳門地道的方言，有著濃厚的地方色彩，外地人恐怕很少了解其涵義，在《辭海》、《廣州話方言詞典》和《漢語外來詞詞典》等許多詞典中都未見“前地”詞條，究竟這個詞在何時出現，又是如何出現，實難以稽考。已知用“前地”作為澳門公共街道標誌見於1869年，然而，在此之前澳門已使用它也是可以肯定的。“前地”由葡文“Largo”、“Praça”和“Praceta”三個詞翻譯過來，然而這三個詞的本意都不是指“前地”，而是指“廣場”，“廣場”究竟為何被轉書為“前地”，一時亦無法詳究。¹⁵而“廣場”在澳門是新生事物，最早出現在1989年的7月3日。以往的同類型空間，都稱為“前地”。¹⁶

那麼“前地”的詞源來自那裏？根據林永勝的研究，新會、順德一帶的村民，習慣於把一些公共聚會的空地稱為“地塘”。“前地”的空地，在功能和環境方面與“地塘”相似，不沿用“地塘”一詞，或許因為天主教有稱伊甸園為“地堂”的說法，這詞正好與“地塘”發音相同，為免在使用上混淆便另造了“前地”一詞。當然，“前地”具有更廣的涵義，它包括一定的城市意識。但“前地”一詞確是透過華葡兩族人士的交往融合而產生的，反映了他們在文化碰撞的交往中各自調整和相互適應，可以說“前地”是澳門葡人與華人長期交往取得文化共識的結果。¹⁷

除了標幟上有“前地”這個非中非西的澳門特色外，澳門的中西交融在街名上也有反映，如火船頭街（Rua das Lorchas）中的火船

15. 林永勝：《澳門前地空間》，載於《文化雜誌》第53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04年冬季刊，第1頁。

16. 傅玉蘭：《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載於《澳門研究》第5期，第58頁。

17. 林永勝：澳門前地空間，於《文化雜誌》第53期，澳門文化局出版，2004年冬季刊，第3頁。

（Lorchas），其船身是歐洲式，而船帆則是中國式，這是19世紀澳門的一種三桅快速帆船，又是一類非中非西的產物。當時這種帆船航行於澳門和東南亞以及日本、朝鮮半島之間，直至20世紀蒸汽輪船興起，這種帆船才逐漸消失。

像這種非中非西的產物正是中西深度交融後的結果，你不但無法說這是中式的或是西式的，甚至很難把它裏頭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元素劃分開來，因為二者已經渾然一體，相融相合，這也正是澳門文化的最顯著，也是最具價值的特徵。

六、結語

街道尤如把城市各空間、各建築銜接起來的筋脈，把城市連接成為一個整體。而作為公共空間，街道又有無數的城市人在此留下痕跡，並為街道注入了城市的文化特徵。傳統街道反映著歷史肌理的變遷，其中既有物質層面，也有精神層面的。如果說，街道是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其佈局和走向涉及到物理空間的規劃，那麼，街道名稱的選擇和取捨則屬於文化空間上的規劃，是一種話語權的反映。通過以上對澳門街名的闡釋，我們不難看到正是在街名中，澳葡政府表達了他們權力的運用，強調葡萄牙歷史的光榮時刻以及葡人在澳門的耕耘與貢獻，同時也著力通過街名來紀念那些屬於其體制內的政治人物，以此塑造出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政治圖景，另一方面，就在掌權者不斷更迭而成為歷史痕跡的同時，薪火相傳的文化則伴隨著澳門的歷史共同前進，澳門的街名也通過符號的形式把這個小城中西文化的並存和交融體現了出來。這反映著中西交融、和而不同的街名文化，也正是澳門的城市文化，正是值得人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